

青年女性回流与家庭经营危机

——基于陪读妈妈的经验分析

□ 李永萍 崔盼盼

摘要：近年来，青年女性返乡陪读现象在中西部农村愈益普遍。基于在多地农村的实地调研，聚焦于返乡青年女性的生活世界，分析其在返乡陪读过程中的多重压力来源及其压力应对路径。返乡陪读的青年女性回归家庭生活，在母职实践中面临亲子互动失衡、代际共育失调和自我价值危机等多重压力，处于家庭压力的旋涡。为了缓解压力以更好推动母职实践，青年女性从亲子关系、代际关系和“做自己”等三个层面积极调适，以跳出家庭压力的旋涡，在个体与家庭之间找寻平衡。

关键词：返乡青年女性；陪读妈妈；家庭压力；母职

DOI:10.19633/j.cnki.11-2579/d.2025.0063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西部农村相继出现外出务工潮。家庭中的青壮年劳动力普遍外出务工，中老年人则留守农村务农，留守问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引发了普遍的社会关注。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农民家庭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农民在城乡之间的流动轨迹渐趋复杂，其中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青年女性回流县域社会，这一现象在2010年之后尤为普遍。青年女性回流最直接的原因是为了孩子的教育，大部分青年女性返乡主要是为了陪读，由此形成了“陪读妈妈”群体。也就是说，当前农民家庭的核心目标不再局限于家庭资源积累，而是要同时兼顾资源积累和子女教育双重目标，导致农民家庭分工模式的复杂化，形成了老年人留守农村、年轻丈夫在外务工、年轻妻子返乡（在县城或乡镇）陪读的家庭劳动力配置格局，“一家两制”的家庭形态逐渐向“一家三制”转变^[1]。这固然凸显了年轻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主导地位，然而也将其置于家庭压力的中心地带，回流县城的青年女性被置于一个非常复杂的生活处境之中。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进入返乡青年女性的生活世界，探讨其压力卷入路径和压力调适策略。这不仅有助于理解返乡青年女性的

生活境遇，而且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当下农村家庭的经营逻辑。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思路

青年女性返乡陪读形塑出“陪读妈妈”这一群体，对陪读妈妈的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议题之一，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探讨青年女性为何要返乡陪读；二是探讨青年女性返乡之后如何陪读，即返乡女性的母职实践研究。

1. 青年女性返乡陪读原因研究

这方面研究主要从宏观和中观两个角度切入。一是宏观的结构-制度视角。这一视角主要聚焦于宏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如何影响农民家庭的教育行为。研究者认为，农村家庭的陪读现象在根本上是源于教育资源配置的城乡失衡与教育质量的城乡差异扩大^[2]。叶敬忠指出，以“撤点并校”为主要措施的教育上移导致农村学生不得不进城上学，增加了农村家庭的教育负担^[3]。齐薇薇认为，农村青年女性返乡陪读在根本上源自县域教育公共品供给与农民家庭的教育需求和教育期待不匹配^[4]。王旭清认为，县

域教育失衡和被动城镇化是造成农村家庭养育困境的主要原因,盲目的教育进城导致农村家庭陷入高成本和高风险的养育困境^[5]。还有研究指出,陪读现象是激进教育城镇化的产物^[6],一些地方政府出于推动城市化发展和提升公共服务效率的考虑,将基层教育资源更多向城市集中,由此也加剧了农村陪读现象的普遍化^[7]。

二是中观的家庭视角。这一视角主要将陪读行为视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家庭策略^[8]。研究者认为,在隔代教育弊端愈益凸显^[9]、家庭再生产目标转换^[10]、农村阶层分化和教育竞争兴起^[11],以及年轻父母基于自身经历的教育觉醒等多重因素的叠加之下^[12],农村家庭越来越重视子女教育,亲代陪读是其重视子女教育的突出体现。王晓慧和刘燕舞将家庭视角进一步操作化,指出家庭目标、家庭收入、家庭分工、家庭周期和家庭分层这五个方面构成一个系统,共同影响农村家庭的陪读抉择^[13]。雷望红认为,陪读是农村家庭为了实现阶层流动而进行的教育风险投资^[14],由于农村家庭经济能力和教育能力匮乏,导致其陪读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周飞舟和宋丹丹基于传统家庭伦理观念来分析返乡女性陪读现象,认为母亲陪读是中国家庭主义中心观的重要体现^[15]。

2. 返乡青年女性的母职实践研究

在现代化和市场化进程中,母职实践层层加码,“当妈越来越难”^[16]。研究者认为,随着“竞争型教育”的普遍出现^[17],母职实践已经从城市向广大乡村社会蔓延,城乡社会的母职实践都越来越具有“密集母职”的特点^[18]。“密集母职”这一概念由美国学者海斯提出,是其基于美国白人中产阶级的教养实践而提出的一种母职理想类型。在中国社会中,密集母职不仅普遍存在于城市中产阶层^[19],而且在农村社会也越来越突出,后者主要表现为“母亲陪读”的形式^[20]。

由于家庭生计、教养资本以及文化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农村家庭的母职实践与城市家庭具有较大差异。雷望红将城乡母职形象分别概括为“城市虎妈”和“农村猫妈”,并指出城乡家庭资源动员能力和教育竞争环境的差异是形塑城乡母职分化的关键原因^[21]。王旭清认为农村陪读母亲的母职实践呈现出极度自我剥削的特征^[22],这与城市年轻母亲“经纪人化”的母职或“扩大的母职”实践均有所不同^{[23][24]},后者可以调动的资源和支持更多。相关研究认为,返乡女性主要是通过“照料的身心在场、教

育的精细投入和教养的家庭整合”来完成其母职实践^[25],并从责任意识、身份认知、生活秩序与亲职能力四个层面重构了母亲身份,逐渐成为“奉献型母亲”。总的来看,既有研究普遍认为返乡女性在母职实践中具有较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但囿于家庭资源和自身能力的限制,她们在母职实践中也面临重重困境。

3. 研究思路:回归返乡青年女性的生活世界

既有研究关注的焦点主要在于“陪读”的行为和事件,较少关注作为陪读主体的青年女性在此过程中的体验和感受,青年女性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个承担陪读功能的角色。有少部分研究关注到陪读对青年女性的负面影响,例如,吴惠芳等认为,陪读妈妈被固化在无酬的照料劳动中,既被劳动力市场所排斥,同时也强化了其对家庭的依附性。罗曼认为陪读并没有提高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反而将其禁锢在更为狭窄的空间里,限制了其自我价值的创造和实现^[26]。还有研究关注到陪读妈妈普遍面临比较大的精神压力^[27]。但是,这些研究均只是在相关研究中顺带提及陪读对青年女性的影响,较少关注返乡青年女性的生活世界以及她们在陪读过程中面临的多重压力。

返乡陪读不仅直接改变了青年女性的生命历程和生活轨迹,而且重构了其生活世界和生活场域。随着她们从打工地返回县域社会和家庭场景,她们以更日常的方式参与家庭经营过程,其在家庭中的角色从以资源积累为主转变为以抚育子女为主。其中一个最关键的变化在于,她们回归到家庭生活中心,其日常生活场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与之相关的家庭关系也发生根本改变,她们需要同时处理亲子关系、代际关系等多重家庭关系。不可否认,大部分返乡女性在家庭中具有较高的话语权^[28],家庭资源配置、子女教育安排等均是青年女性主导。但值得注意的是,返乡青年女性在主导家庭话语权的同时,也处于家庭压力的旋涡中心,是家庭压力的首当其冲者。家庭压力直接影响着家庭经营状态和家庭生活秩序,在此意义上,返乡青年女性如何应对和调适压力,不仅关乎其个人的生活体验和价值实现,而且关乎农民家庭的生活秩序。基于此,我们需要进入返乡青年女性的生活世界之中,从青年女性主体的视角去分析陪读之于女性的压力,以及她们如何调适压力。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将在实地调研基础之上,系统分析返乡青年女性的压力来源以及其压力应对策略,并在此基础上探

讨家庭变迁中青年女性如何处理个体与家庭之间的关系问题。

二、田野介绍与研究方法

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返乡陪读的年轻母亲，经验材料主要来自笔者的三次田野调研，分别是2021年7月在安徽D县Y镇的调研，2024年5月在四川C区J镇的调研以及2024年7月在湖北L县A镇的调研。这三地均属于中西部普通农业型地区，村庄中的青年人普遍外出务工，三个田野点在农业形态、农民家计模式、家庭收入状况等方面具有较强同质性。在子女的教养模式方面，这三地也具有同质性，之前三地均是以隔代抚育为主，而最近十年开始兴起年轻妈妈返乡陪读现象。为了孩子的教育是青年女性返乡陪读的直接推动力，但是，返乡女性仍然要考虑生活问题。返乡青年女性的生活问题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县域社会是否有充分的就业机会，这决定了返乡女性是否可以采取“半工半陪”的方式以补贴家用。二是县域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如何，这决定了返乡女性对现代化和城市化生活方式的追求能否在县域社会中获得满足。在此主要结合笔者上述三次田野调研情况，简要介绍近年来中西部县域社会的变迁与发展如何从不同层面回应了返乡青年女性的需求，进而推动其作出返乡陪读抉择。

首先，中西部地区县域产业发展条件有所改观。近年来，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以及环保政策要求越来越严，东部地区部分产业逐渐向中西部地区的县城转移。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主要是一些小型加工厂，这些产业主要吸纳女性劳动力就业，尤其是青年女性。例如，笔者调研的安徽D县和湖北L县近年来都新增了不少中小型加工厂，规模较小的只需招募几个工人，规模较大的可以容纳上百个工人。安徽D县Y镇截至笔者调研期间大约有四五十家大大小小的工厂，其中服装厂和箱包厂最多。这些工厂大多分布在县城或乡镇学校周边，其工人以返乡陪读妈妈为主。相对于沿海大城市而言，中西部县域的工资水平更低，技工的工资一般为每月3000~4000元，普通工人的工资为每月2000~3000元。虽然县域社会的工资水平比不上外出务工收入，但也可以缓解家庭的部分经济压力，基于此，很多陪读妈妈都会在陪读的同时尽可能兼顾打工，这种“以工养学”的模式为其返乡之后的母职实践提供了经济基础^[22]。

可见，县域社会的产业发展为青年女性回流奠定了基础，

其次，县域社会基础设施和商业生态渐趋完善，满足了返乡青年女性对现代化和城市化生活方式的需求。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外出务工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更多经济收入，还在于体验和接触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如果家乡的县域社会也能回应其对生活方式的需求，那么就有可能进一步增加其回流的可能性。近年来，中西部地区的县域社会有很大发展，并主要从两个层面回应了年轻人对现代生活方式的需求：其一，县域社会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县、乡、村之间在生活服务配套方面的差异，使得县域社会内部的生活梯度趋于弱化，这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可选择的生活空间。无论返乡年轻人是住在县城抑或乡村，其对现代化和城市化生活方式的需求均可以获得满足^[29]。其二，县域社会商业生态的完善，满足了年轻人对城市生活方式的需求。例如，近年来大部分中西部县城都开始出现大商场和大超市，连锁奶茶店、咖啡店等在县域社会也非常普遍，深受年轻人欢迎。因此，对青年女性而言，返乡并非意味着要回到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她们依然可以在家乡县域社会中延续其城市化的生活方式。

本文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调研期间，笔者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的方式收集相关资料，访谈对象主要包括返乡陪读妈妈、中小学教师、陪读妈妈的子女以及陪读家庭的老人等，每位访谈对象的访谈时长为2~3个小时。出于论证的方便，本文中使用的经验材料主要来自笔者对其中12位返乡陪读妈妈的访谈，其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受访者基本信息

序号	代号	出生年份(年)	学历	返乡陪读时间(年)	子女情况
1	小平	1984	初中	6	大女儿上高中；小儿子6年级
2	燕姐	1981	初中	7	大儿子今年高考；小儿子上小学
3	梅子	1987	高中	5	大儿子18岁；小女儿16岁
4	小江	1987	初中	5	大女儿16岁，上职高；小儿子14岁
5	艳梅	1982	初中	6	大女儿14岁；二女儿11岁；小儿子3岁

(续表)

序号	代号	出生年份(年)	学历	返乡陪读时间(年)	子女情况
6	小妮	1995	初中	3	1个儿子, 8岁, 上小学
7	康姐	1984	初中	10	大女儿16岁; 小儿子10岁
8	琼姐	1980	初中	7	大女儿20岁, 上大学; 小儿子13岁
9	陈姐	1983	高中	7	大儿子15岁, 上初中; 小女儿1岁多
10	平平	1982	小学	13	大女儿20岁, 上大学; 小儿子13岁, 上初中
11	小欣	1987	初中	5	大儿子12岁; 小女儿7岁
12	小桥	1982	高中	3	大儿子今年参加高考; 小儿子上小学

三、压力旋涡： 返乡青年女性的多重家庭压力

基于自身成长经历的教育觉醒是促使青年女性返乡陪读的内在驱动力, 同时, 弥散在县域社会中的教育焦虑也是推动其返乡陪读的重要催化剂。在中西部地区, 教育资源向县域社会集中已经成为一个普遍趋势, 这直接改变了县域教育的整体生态, 其结果是教育质量在县乡村之间的显著分化。有条件、有关系、有能力的家庭总会想方设法地将子女送到县城学校, 而这进一步加剧了县域教育生态的失衡, 扩大了县域教育资源的城乡分化, 导致越来越多家庭卷入将子女送到县城上学的浪潮之中。

青年女性返乡陪读直接改变了农民家庭的生活逻辑, 即从以资源积累最大化为目标扩展为要同时兼顾家庭资源积累和子女教育这双重目标。为了有效实现上述目标, 农民家庭分工随之调整, 主要呈现出两种新的家庭分工形态: 一种是青年女性返乡陪读、其丈夫依然在沿海大城市务工。这种分工模式在返乡陪读家庭中比较常见, 也是一种相对稳妥的分工方式, 家庭面临的风险相对较小。青年女性回流意味着家庭收入减少, 维持丈夫经济收入的相对稳定可以避免因女性回流后经济收入骤减对家庭的冲击。另一种是年轻夫妻共同从沿海大城市返乡, 青年女性返回县城以陪

读为主, 其丈夫则就近在家乡所在地市或省会城市务工。与第一种家庭分工模式相比, 第二种家庭分工模式的风险更高, 因为中西部地区的务工收入明显低于沿海大城市。但无论是上述哪种分工形态, 都显著增加了农民家庭经营压力, 这不仅源于家庭经济收入减少, 更在于其对家庭关系带来更大扰动, 并进一步影响家庭作为一个共同单位应对压力和危机的能力。返乡陪读将青年女性置于一个新的生活场域之中, 她们要处理的核心问题不是资源积累问题, 而是家庭关系问题。在上述分工模式下, 返乡陪读的青年女性处于多重家庭关系的焦点, 因而处于压力的旋涡之中。在本部分, 笔者将聚焦于返乡陪读青年女性的生活世界, 分析其在陪读模式中所遭遇的家庭压力。

1. 亲子互动失衡

青年女性返乡是以子女教育为核心目标, 这一功能性目标主导了亲子之间的互动逻辑。亲子关系固然建立在日常陪伴和感情基础之上, 但返乡女性并非仅仅满足于对孩子的情感陪伴, 而是期待通过自己的陪伴使孩子在学业上有更大进步。因此, 亲子关系在感情之外还叠加了一层以学业进步为目标的现实取向标准, 这种现实取向的功能性目标决定了亲子互动并不是一种自然的情感互动状态, 而是返乡女性主导的一种相对失衡的互动格局: 当子女的学业成绩达到了陪读妈妈的预期目标, 亲子关系才能维系平和与良性的状态, 然而现实中的普遍情况是, 由于客观条件限制了子女学业进步程度, 陪读家庭中的亲子关系往往比普通家庭更为紧张。这主要与以下两个原因相关。

首先, 由于陪读妈妈与子女之间通常有较长时间的空间分离, 导致亲子之间有距离感, 亲子之间的情感基础不强。青年女性返乡陪读发生于家庭生命周期中的特定阶段, 大部分陪读妈妈之前都是和丈夫一起在外务工, 到了孩子成长的关键节点开始考虑返乡。很多陪读妈妈在之前并没有和孩子长期一起生活, 孩子对母亲有距离感, 而母亲对孩子的生活习惯和性格也没有那么了解, 由此导致亲子互动的效果不佳。尤其是当孩子正处于叛逆期, 缺乏情感基础的亲子互动往往会加剧亲子关系紧张。此时的亲子互动状态往往是: 陪读妈妈非常积极, 而子女却非常消极, 子女的消极反馈不仅让陪读妈妈束手无策, 同时也让部分陪读妈妈心里非常委屈。

小平与大儿子的关系比较紧张, 小平在大儿子上初一时返乡陪读, 但孩子似乎总是要和她反着来, “(儿子)好像什么都和我反着干, 叫他学习就不学,

写作业就不写，吵着要买手机。平常也很少表达，不知道他心里真实想法”。（访谈编码：20240718）

其次，亲子关系紧张还源自陪读妈妈对子女学业的高期待。陪读妈妈对子女的学业成绩普遍具有较高预期，但她们囿于自身受教育水平的局限，并不能真正从知识教育上给予子代多少辅导，因此她们大多通过“密集看护”的方式对子女严格管教，尤其是对子女有严格的时间管理和空间监控。陪读妈妈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隔绝外界一切不利于孩子学习的因素，让孩子能够将心思更多用在学习上。然而，对大部分孩子而言，父母管得越严，孩子反而越容易产生逆反心理，进一步扭曲亲子关系的互动，由此导致亲子关系容易陷入紧张状态。紧张的亲子关系轻则表现为子女经常和父母斗嘴，重则表现为比较严重的亲子对立。

平平向笔者讲述了她和女儿一次比较严重的冲突，“我女儿成绩一直比较好，有一年因为家里在农村种植木耳，我就让她奶奶来县里带了一段时间。我每天都打电话问婆婆，女儿今天表现怎么样。婆婆说很好、很乖。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过了一段时间不放心，我还是自己去县里陪读。到晚上该睡觉的时候我也装着睡了，结果发现女儿躲在被子里玩手机，我一气之下就把手机给她砸了。那一次我冲她发了很大的火，问她为什么那么不听话，究竟还要不要读书。女儿也生气，她心里也不服，咬牙切齿地看我。骂着骂着我自己坐在那里急得哭。女儿看到我哭了也知道自己错了，说妈妈我会努力的”。（访谈编码：20210717）

当面对紧张的亲子关系时，除了可能会爆发情绪之外，大部分陪读妈妈会选择隐忍，因为她们担心自己的情绪爆发影响孩子的情绪和学习状态。对陪读妈妈而言，她们只能通过更多的情感投入以期待子女能够理解其良苦用心。然而，无条件的情感投入以及长期的情绪压抑，消耗了陪读妈妈大量的精力和心力，使得她们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压力。

康姐对此很有感触，她觉得自己的付出没有获得回报，“我放弃所有来陪你，结果你学习上还不努力”。同时，康姐还说她感觉自己面临孩子时很卑微，“在她面前我都小心翼翼，生怕说错话，要照顾她的情绪。感觉自己有点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访谈编码：20210722）

事实上，返乡陪读主要源于父母对自身成长经历的反思。从农民家庭的角度，陪读被视为履行教养责任的必要方式。问题是，在当前社会条件下，子女的

成长和教育早已经突破家庭的框架，无论是学校的教育资源和教育策略，还是社会环境的复杂化，都直接而深刻地影响子女的成长状况。对普通农民家庭而言，通常无法获得高质量的教育资源，也往往缺乏应对手机游戏诱惑的有效方式，故子女的教育成长状态常常并不如意，而这些外部结构性因素导致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由陪读妈妈来承受，并最终转化为亲子之间的压力。

2. 代际共育失调

随着家庭少子化和家庭权力结构的变迁，当前农民家庭中的代际冲突越来越少，代际关系呈现出比较和谐的特征。代际之间的空间分离是缓和代际关系的重要因素。然而，回流到县域社会的青年女性往往会卷入更加日常化的代际互动之中，由此增加了代际冲突的可能性。出于家庭经济等方面的考虑，返乡陪读的青年女性通常都要在县域社会找一份工作，这就决定了青年女性无法独立完成育儿任务，需要公公婆婆适度协作育儿，形成一种新的代际合作育儿模式。通常情况下，公公婆婆主要是在小孩的日常生活和接送等方面予以协助，而青年女性则主要负责小孩的学习和行为管教等方面，形成了“教养分离”的代际育儿分工^[30]。因此，在青年女性返乡陪读的家庭中，两代人之间基于观念的差异总会存在或多或少的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农民家庭的代际冲突与传统社会的代际冲突具有较大差异，后者主要是聚焦于家庭资源的分配与博弈，而前者主要是基于生活话语权的争夺，即两代人之间由于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等方面具有根本性差异而产生的冲突^[31]。在青年女性返乡陪读家庭中，代际冲突主要聚焦于孩子的养育问题。祖代仍然秉持相对传统的育儿观念，而青年女性则大多认同现代科学育儿，由此导致双方在育儿方面会产生诸多矛盾，如孩子的饮食问题、穿衣问题、习惯问题等等。这些冲突虽然不至于对代际关系产生根本性撕裂，但却让身处其中的当事人感觉非常痛苦。

小欣返乡陪读已有五年时间，谈及陪读过程中的压力，她认为最大的压力就是婆媳关系的处理，她与婆婆之间在育儿观念上具有较大差异。她说，“一般（有矛盾）都是因为孩子的事，观念不一致。比如婆婆说我让孩子学得太多了，嫌接送太麻烦了。又说孩子太调皮了，说我不管。你说我怎么管？小孩就是有很多精力，你不让他释放，他怎么办？”（访谈编码：20240522）

对小欣这样的返乡陪读妈妈而言，婆媳矛盾之所

会以对其构成压力，不是因为她们在婆媳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而是因为她们意识到自己在婆媳互动中处于无奈和无力的境地。也即，这些返乡陪读妈妈一方面难以接受婆婆在育儿过程中的诸多观念和习惯，但另一方面由于她们普遍对婆婆协助育儿具有刚性需求，因此又不能与之发生正面冲突，不能撕裂代际关系，如此就可能积累很多负面情绪。如果这些负面情绪不能得到及时的化解和清理，必然就会增加返乡青年女性内心的压力和焦虑。

3. 自我价值危机

除了要面临紧张的亲子关系和微妙的代际关系之外，返乡陪读的年轻女性还普遍面临自我价值危机的处境。在返乡陪读之前，年轻女性大多是和丈夫一起在大城市务工，她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经济来源，这一方面让她们能够真切感知到自己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另一方面还能使年轻女性从工作中获得价值感与意义感。然而，陪读作为一项隐性且无酬的家务劳动，很容易让年轻女性产生自我价值危机。在田野调研中，有不少返乡陪读女性都坦言自己在陪读过程中要不断做心理建设，否则可能难以坚持下去。因此，返乡陪读女性要不断学习如何自我调适，尽可能以一种积极姿态来践行母职。

谈及陪读的体会，“90后”陪读妈妈小妮说，“陪读就是完全陪孩子，没有自我了，也谈不上自己的价值。带小孩，带出来是赚，带不出来是亏，没办法评估，只能说是做父母的义务，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不然可能就坚持不下去”。（访谈编码：20240714）

具体来看，陪读妈妈的自我价值危机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经济上的无用感。返乡陪读不可避免降低了年轻女性对家庭的经济贡献，虽然其余家庭成员并不会因此而责备年轻女性，且大多能看到年轻女性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在为家庭付出，但是不少年轻女性仍然难以释怀。尤其是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实现“半工半陪”的年轻女性，其经济上的无用感尤甚。二是生活的无意义感。年轻女性的陪读生活看似非常轻松，但实际上又异常忙碌，且每天的生活都无限循环。三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实际上，返乡青年女性通常将自我价值的实现建立在子女教育之上，直接表现就是子女最终能否考上一个好大学。然而，囿于家庭资源和县域教育资源的限制，大部分返乡女性可能都无法实现其预期的教育目标，这对返乡女性的价值感而言将是致命的打击。此时，她们将陷入更加焦虑和自我价值危机的处境，这对家庭经营而言也是一种

深层次危机。

小江刚开始返乡陪读那段时间很不适应，“感觉生活一下子回到了原点，不太习惯，虽然陪孩子很开心，但是我每天的生活感觉就像被圈在笼子里，洗衣服，做饭，搞卫生，每天都是这些事情，天天循环，不累，也不觉得多轻松。感觉看不到未来，焦虑、迷茫，但是又没有办法”。（访谈编码：20210724）

青年女性以子女教养为契机的回流，使得农民家庭经营和家庭再生产能够立足县域社会实现经济收入与子女教养之间的相对平衡，从而强化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因此，从家庭整体发展的角度而言，青年女性回流具有其积极意义，赋予家庭以更多向社会流动的可能性。然而，如果立足青年女性自身而言，回流县域社会确实给其带来沉重的压力和负担，这种压力和负担集中汇聚于青年女性如何处理好以自身为焦点的各种关系。尤其是当其回流的初始目标——子女教育成才——未能如愿，又无法在家庭内获得足够的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时，就可能遭遇家庭经营的反噬，不同家庭关系维度的压力都向青年女性汇聚，致使其陷入难以挣脱的家庭压力之中。

四、返乡青年女性的压力应对策略

以上分析说明，在开放流动的城乡中国时代，农民家庭经营面临着多重风险。返乡青年女性处于家庭经营压力的旋涡之中，能否跳出这个旋涡，不被这个旋涡吞没，关键在于青年女性能否比较好地调适自己的状态。从田野调研情况来看，回流县域社会的青年女性应对压力的主要方式是如何在家庭与个体之间找寻平衡，而非走出家庭。相应地，其压力调节的基本路径是，通过家庭角色和家庭关系的调适而尽可能缓解压力，以更好推动其母职实践。其中，强化亲子关系纽带可以为其提供重要动力支撑，积极调适代际关系可以减少其部分压力来源，而兼顾工作则是其自我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

1. 为母：亲子关系的调适与平衡

子女教育是促使青年女性返乡的直接动因，因此很多年轻母亲最初都对子女学业抱有非常高的预期，但在实践中却发现，子女的学业成绩并不必然因为母亲返乡陪读而有明显提升，此时大部分陪读妈妈都会陷入焦虑状态。但焦虑并不能解决问题，因此大部分陪读妈妈在焦虑过后会积极反思，并通过适度降低对子女的学业期待和注重情感教育两种方式调适亲子

关系,避免亲子关系陷入过于紧张的状态。

首先,调整对子女教育的预期,从“成才”到“成人”的转变。笔者在调研中遇到不少案例,青年女性最初都抱着非常高的预期返乡陪读,返乡之后却发现陪读并不必然带来子女学业成绩的提升。这是因为,对大部分农村青年女性来说,囿于自身知识水平和综合能力的局限,她们在陪读过程中往往只能做到对子女无微不至的生活照料,很难在学业上直接辅导子女。基于此,青年女性基于陪读的教育参与始终还是高度依赖于学校教育资源的供给这一约束性条件。当意识到这一现状之后,很多陪读妈妈对子女的教育预期经历了从“成才”到“成人”的转变。当然,这一转变过程中一定充斥着年轻母亲内心的不甘,但在现实条件约束之下,她们往往只能抱持“不能成才也要成人”的底线目标,避免对孩子过度的高预期带来亲子关系紧张。

其次,以情感教育替代严厉管教。严格的时间管理和空间监控是大部分陪读妈妈常用的管教方式,但正如上文所言,这种方式很容易引起孩子的反感,因此一些陪读妈妈开始注重情感教育,希望以此来提升子女的学习动力和积极性。情感教育需要建立在亲子之间亲密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情感教育包括两个层面:一方面是要及时关注子女的情绪,并给予及时的情绪疏导和情感沟通,避免子女因为情绪问题而影响学习;另一方面是以“情”来感化人,通过情感教育让子女知道父母的辛苦付出与不易。相对于传统的严厉管教而言,情感教育具有柔性和间接性的特征,但其效果也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对一些心理比较敏感的孩子而言,情感教育可能进一步加重子女的心理负担。当学习成绩不理想时,子女可能会将所有原因归于自身,进而陷入极度内疚的心理状态,这对其成长显然不利。

平平对女儿就经常采用情感教育的方式,她经常对女儿说,“你爸爸一个人在外挣钱多不容易,还要自己做饭洗衣服,你不好好学习,怎么对得起父母。我陪你们读书,一天跑那么多趟,风雨无阻,像快递小哥一样”。(访谈编码:20210717)

通过调整在亲子互动中的心态,一方面可以尽量避免亲子关系陷入过度紧张的状态,另一方面也能让青年女性获得更多动力支撑。对这些返乡陪读妈妈而言,“为了孩子”是她们能够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因此,当亲子关系比较顺畅时,青年女性就可以从亲子关系中找到坚持下去的情感动力。从亲子互动中获

得的情感支持,可以大大降低返乡青年女性的心理压力。

2. 建立边界与寻求支持:积极调适代际关系

返乡青年女性与公公婆婆之间的冲突主要聚焦于育儿冲突,而代际育儿冲突在根本上是源于两代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差异,这种差异很难从根本上抹平,因此需要积极调适以尽可能缓解代际冲突对家庭秩序的冲击。

具体来看,返乡青年女性主要通过以下三种策略来积极调适代际关系:一是确立基本边界。在合作育儿初期,返乡年轻女性通常就会与公公婆婆积极沟通,明确两代人的育儿分工,确立以年轻女性为主导的育儿权力格局,祖代只是作为辅助者参与育儿。如此一来,当出现育儿冲突情境时,年轻女性就有以自己意见为主的正当性。二是适度隐忍。虽然年轻女性在育儿过程中掌握主导权,但是基于对父代协助育儿的刚性需求,年轻女性在育儿实践中并不总是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她们也会适度隐忍。

小欣虽然对婆婆的很多习惯和观念都看不惯,但是她与婆婆从来没有发生过正面冲突,“我一般就不说,保持沉默,她说她的,我还是按我自己的意愿做,我肯定不听她的,但是也不想吵架撕破脸,没必要”。(访谈编码:20240522)

三是适时寻求支持。当遭遇代际关系紧张或冲突时,青年女性也会积极寻求丈夫的支持和理解,丈夫的情感反馈和支持对青年女性而言非常重要。虽然并非每个丈夫都能给予妻子适时的理解与支持,但青年女性可以通过与丈夫的沟通和交流获得情绪释放的空间。因此,对返乡陪读女性而言,丈夫的角色非常关键,丈夫适时的情感支持构成青年女性的坚强后盾。

平平每次与婆婆发生矛盾之后,都会在晚上视频时给丈夫说,“我和婆婆有矛盾后,一般都要给老公说,老公会安慰一下,说他妈就是那样的人,改不了,和他说一说心里就舒服一些,他开开玩笑,就过去了”。(访谈编码:20210717)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确立代际边界或适度隐忍,还是寻求丈夫的支持,返乡青年女性与公婆之间始终没有直面冲突,而是通过一系列策略来尽可能缓解代际合作育儿中的矛盾。因此,虽然在上述三种代际关系调适策略之下代际关系呈现出比较和谐的状态,但返乡青年女性与公婆之间的关系始终并不自然和亲密,双方之间存在一定隔阂,代际关系处于“亲

而不密”的状态。

3.“做自己”：通过工作实现自我价值

返乡陪读妈妈大多是采取“半工半陪”的模式。“半工半陪”首先是源于家庭经济的需要，大部分农村家庭经济收入有限，因此返乡女性通过“半工半陪”的方式可以实现“以工养学”，由此减轻家庭经济压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对很多陪读妈妈而言，她们往往是主动选择“半工半陪”，而非在家庭经济压力之下的无奈选择。也就是说，有一份工作对陪读妈妈而言非常重要，通过工作她们不仅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经济独立，而且可以拓展其社会交往圈，是实现其自我价值的重要路径。

首先，“半工半陪”可以增强陪读妈妈的经济独立。在田野调研中，不少陪读妈妈谈及返乡之后的体会时，都会特别提到一定要有一份自己的工作。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使得青年女性既不用总是开口找丈夫要钱，也不至于过度依赖公婆在经济上和生活上的支持。换言之，一定的经济独立才能保持其生活状态的延续性，也才能使得返乡青年女性在家庭关系互动中保持主动权。尤其是在夫妻之间的情感纽带遭遇现实压力考验的情况下，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位才能避免女性陷入过分被动的状态。

梅子在返乡陪读时坚持要找一份工作，她说，“有工作才有底气，尤其是夫妻吵架的时候，不会觉得低人一等。自己挣钱自己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访谈编码：20240711）

其次，“半工半陪”可以扩展其社会交往圈。这些返乡青年女性实际上是“村庄中的村外人”。她们中的大部分都是在结婚之后就以外出务工为主，在家乡生活的时间非常有限，因此在本地几乎没有朋友。找一份工作是她们拓展自己社交范围的重要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县域社会内的陪读产业往往是一种作坊式的非正规形态，其相对松散的管理模式对工作场景之内的社交行为具有较大的包容性。事实上，回流县域社会的青年女性的朋友圈主要依赖于工作关系网络的拓展。对这些返乡青年女性而言，社交不仅是基于个人打发闲暇时间的社会性需求，而且是其获得社会性支撑的重要途径。通过建构自己的社交圈，青年女性在家庭关系中的压力也有一个可以纾解的渠道，其在家庭中遭遇的负面情绪可以向朋友诉说，这有助于避免青年女性彻底陷入家庭经营压力的旋涡，避免其被家庭围困。

以上从亲子关系调适、代际关系调适和“做自

己”三个层面分析了返乡青年女性的压力调适策略。可以看到，其压力调适的直接目标是通过纾解各种压力让自己生活更加自洽，使个人尽可能跳出家庭压力的旋涡，而其更深层次的目标则在于通过压力调适实现个体与家庭之间的平衡，以更好实现其返乡的母职实践。在返乡女性的压力调适过程中，其自我意识在很大程度上被激发出来。但值得注意的是，其自我意识的激发在根本上源于家庭经营面临的现实压力，故其自我意识的凸显并不会突破家庭，而是成为其调适家庭压力的心理基础。也即，虽然返乡青年女性的自我意识在其主动的压力调适过程中有所凸显，但其始终嵌入家庭经营的整体逻辑之中。在此意义上，不应将青年女性压力调适中的自我意识视为一种抽象的权利意识，而是依然需要将其置于家庭中來定位。实际上，返乡青年女性因压力聚焦而触发的反思与自我意识崛起，并不是要突破家庭，而是为了更好地经营家庭。

五、结 论

年轻女性回流县域社会的现象实际上折射了中国城市化进程本身的复杂性。农民家庭并不是被动地卷入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而是展现出了巨大的能动性。然而，家庭在能动适应的同时也更深地卷入了复杂的城乡交互过程，家庭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城乡互动的微观载体。农民虽然怀揣着城市梦，但在现实的压力处境下不得不依赖家庭的代际接力，如此一来，子代的教养状况自然就承载了农民家庭的城市梦，而承担陪读责任的青年女性也就成为压力传导的“前线”。本文聚焦于返乡青年女性的生活世界，探讨其在返乡陪读过程中面临的多重压力以及其压力调适策略。研究发现，基于自身成长经历的“教育觉醒”是推动青年女性返乡陪读的直接动因，而县域社会在产业发展条件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完善为其返乡之后的生活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并进一步推动其作出返乡陪读的抉择。返乡青年女性面临一个与外出务工完全不同的生活世界，她们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陪读践行其母职，在母职实践中需要同时处理好亲子关系、代际关系等多重关系，处于多重家庭关系的焦点使得她们背负很大的精神压力。返乡陪读的青年女性往往处于家庭压力的旋涡。为了缓解压力以更好践行其母职，青年女性通过积极调适亲子关系、代际关系以及尽可能兼顾工作，以在家庭和个体之间找寻平衡。

本文关于青年女性回流的分析一方面展现了家庭经营的能动性调适逻辑,另一方面也展现了现代化过程中家庭经营的压力与风险的配置格局。实际上,随着农民家庭目标的多元化和家庭分工的细密化,家庭经营的风险显著增大。家庭经营不再仅仅是一个基于劳动力动员与整合的资源获取行为,而且需要在此过程中协调日益复杂且愈加脆弱的家庭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家庭压力并不是均衡分配给每一位家庭成员,而是非均质化的分布,部分家庭成员将是家庭压力的主要承受者。且家庭分工的功能性指向越强,家庭压力的分配就越容易失衡,因为只有建立在压力不均衡分配的基础上,才可能集中优势力量实现家庭资源积累最大化和资源分配最优化。在“一家三制”的家庭分工模式下,返乡陪读的青年女性是家庭压力的主要承担者,她们的压力主要不是经济层面,而是如何处理好以自身为焦点的各种家庭关系,这对返乡青年女性而言是一个很大挑战。还需说明的是,中老年父母和青年女性的压力承受能力也具有较大差异,这不是

基于其个体特征的差异,而是由于其在家庭中所处的位置和角色不同。对中老年父母而言,因为代际之间的伦理底色支撑,中老年人可以将其面临的压力合理化,故其承受压力的能力较强。与之不同,返乡青年女性只能依赖于亲子关系纽带寻找动力支撑,但这条纽带却并非那么坚固和有韧性,尤其是当回流青年女性的教育预期难以实现时,她们往往处于崩溃的边缘,其压力承受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自我调适能力。■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农民家庭代际合作育儿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1CSH030)的阶段性成果]

李永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崔盼盼: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汪永涛

参考文献:

- [1] 张一晗.教育变迁与农民“一家三制”家计模式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22(2):61-69.
- [2] 吴惠芳,吴云蕊,陈健.陪读妈妈:性别视角下农村妇女照料劳动的新特点——基于陕西省Y县和河南省G县的调查[J].妇女研究论丛,2019(4):28-38.
- [3] 叶敬忠.作为治理术的中国农村教育[J].开放时代,2017(3):163-179.
- [4] 齐薇薇.县域教育“供给-需求”匹配视角下母亲陪读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22(1):76-83.
- [5] 王旭清.县域教育失衡、被动城镇化与农村家庭养育困境——基于河南省G县的案例研究[J].少年儿童研究,2023(3):88-96.
- [6] 易卓.乡校模式: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第三条道路[J].教育研究与实验,2020(2):43-48.
- [7] 李永萍.农民城市化的区域差异研究——市场区位条件的视角[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1(1):161-170.
- [8] 苏运勋.家庭策略视角下的农村陪读——以豫南S村为例[J].中国青年研究,2020(5):69-75.
- [9] 李永萍.农村家庭隔代抚育的问题化:形成机制与调适策略——基于社会系统论的视角[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97-107.
- [10] 张雪霖.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村新三代家庭结构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120-126.
- [11] 尹秋玲.农村教育竞争兴起的逻辑——从“读书的料”到“不能输在起跑线上”[J].中国青年研究,2022(11):103-110.
- [12] 王旭清.学做母亲:返乡青年女性的母职策略与身份重构[J].社会发展研究,2024(1):183-202.
- [13] 王晓慧,刘燕舞.家庭视角下的农村陪读现象研究——基于湖南省Y村陪读教育史的个案考察[J].农业经济问题,2024(8):97-111.
- [14] 雷望红.阶层流动竞争与教育风险投资——对甘肃宁县“陪读”现象的解读[J].中国青年研究,2018(12):86-92.
- [15] 周飞舟,宋丹丹.回乡陪读的母亲们:城乡融合进程中的家庭与教育[J].社会发展研究,2024(2):1-24.
- [16] 施芸卿.当妈为何越来越难——社会变迁视角下的“母亲”[J].文化纵横,2018(5):102-109.
- [17] 金一虹,杨笛.教育“拼妈”：“家长主义”的盛行与母职再造[J].南京社会科学,2015(2):61-67.
- [18] Hays S.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Motherhood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19] 陈蒙.城市中产阶层女性的理想母职叙事——一项基于上海家庭的质性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18(2):55-66.
- [20] 肖索未,汤超萍.流动的母职:乡城迁移中的母职协商[J].妇女研究论丛,2021(2):66-83.
- [21] 雷望红.中国城乡母职形象何以分化——“教育家庭化”中的城市“虎妈”与农村“猫妈”[J].探索与争鸣,2020(10):148-156.

(下转第119页)

- [5] 曹宣明, 曾兰. 大学毕业生“佛系”就业的生成逻辑及引导策略[J]. 当代青年研究, 2020(2): 70-74.
- [6] 丁京. 从“离土”到“入乡”: 农村青年精英反向流动的空间逻辑[J]. 中国青年研究, 2022(8): 76-84.
- [7] 贺小芹, 张春泥. 从学校到工作的困难转型: 对大学毕业青年退出劳动力市场现象的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 2025(1): 24-33+52.
- [8] 方洁, 翁馨. “上岸”偏好: 一流高校毕业生走向体制内的就业选择——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J]. 中国青年研究, 2023(5): 34-41.
- [9] 岳昌君. 高校毕业生就业观念: 特点、变化与差异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 2023(5): 5-13.
- [10] 王以梁. 大学生“慢就业”的现状、成因与应对策略[J]. 思想理论教育, 2023(11): 106-111.
- [11] 玄铮. 何以困于长衫: 大学生职业角色冲突的归因分析[J]. 中国青年研究, 2024(4): 105-112.
- [12] 胡玉宁, 徐欣. 长衫情结: 当代青年就业的情绪体验与教育学审思[J]. 中国青年研究, 2024(1): 5-13.
- [13] 张慧.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困境及出路[J]. 中国电化教育, 2023(12): 99-105.
- [14] 蔡红建. 大学生盲目考研不可取——考研低年级化现象反思[J]. 人民论坛, 2018(36): 106-108.
- [15] 刘守义, 董励. “考研热”背后的冷思考[J]. 教育与职业, 2014(28): 24-30.
- [16] 高玉梅. 大学毕业生“考研热”的经济学分析[J]. 中国青年研究, 2012(6): 88-91.
- [17] 莫荣. 国外就业理论、实践和启示(科思论丛)[M]. 北京: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13: 306.
- [18] 陈向明. 扎根理论的思路和方法[J]. 教育研究与实验, 1999(4): 58-63+73.
- [19] 陈向明. 质性研究的新发展及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08(2): 14-18.
- [20] 朱姝. 基于工作搜寻理论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分析[J]. 思想理论教育, 2014(6): 95-98.
- [21] 田永坡, 王琦. 数字经济时代网络招聘政策与搜寻渠道选择[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2): 1-12.
- [22] 赵文, 肖双双. 生产率分布与劳动报酬份额: 理论与经验分析[J]. 财贸经济, 2025(3): 110-126.
- [23] 罗冰. 工作搜寻视角下的劳动力供给研究[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6: 144.
- [24] 董占奎. 工作搜寻与社会网络实验研究的观点[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6: 148.
- [25] 陆义敏. 双向搜寻、匹配博弈与大学生就业研究[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9: 35.
- [26] 张顺. 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6): 12-21.
- [27] 边燕杰, 张顺. 社会网络与劳动力市场[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1.
- [28] 姜波, 周一航, 等. 高校毕业生“慢就业”问题再审视——基于时间社会学的考察[J]. 中国青年研究, 2025(4): 34-42.
- [29] 沃尔特·李普曼. 公众舆论[M]. 阎克文, 江红,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11-12.
- [30] 张良驯, 付成梅. “孔乙己文学”背后的青年就业困境与疏解[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23(4): 11-20.
- [31] 张刚生. 互联网舆论对青年大学生就业认知的误导与对策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 2023(5): 51-58+86.
- [32] 侯振中. “躺平”亚文化的生成及反思[J]. 人民论坛, 2021(35): 123-125.
- [33] 刘元春, 丁洋. 社会资本对工资的影响分析——基于搜寻动力减弱的视角[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6): 51-61.
- [34] 郭冉. 制度形塑: 高质量就业结构的转向[J]. 学海, 2022(5): 145-154.
- [35] 陈维, 黄梅, 等. 就业社会支持对大学应届毕业生就业焦虑的影响: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 中国特殊教育, 2020(5): 84-89.

(上接第73页)

- [22] 王旭清. 农村进城陪读母亲的母职实践[J]. 青年研究, 2022(6): 68-79.
- [23] 杨可. 母职的经纪人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J]. 妇女研究论丛, 2018(2): 79-90.
- [24] 陶艳兰. 世上只有妈妈好——当代城市女性的母职认同与实践[J]. 妇女研究论丛, 2013(6): 75-85.
- [25] 牟敏娜. 母职回归: 农村返乡女性的教育觉醒与教育实践[J]. 少年儿童研究, 2023(4): 5-13.
- [26] 罗曼. 强化抑或禁锢——随迁型陪读现象的社会性别视角分析[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6): 111-114.
- [27] 李永萍. “一家三制”: 教育城镇化背景下的亲代陪读与农民家庭形态调适[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2(6): 75-84.
- [28] 蒲琨, 陈讯. 性别失衡、阶层竞争与农村返乡青年女性家庭地位的崛起——基于黔南Z村的调查[J]. 人口与发展, 2018(5): 96-103.
- [29] 白美妃. 撑开在城乡之间的家——基础设施、时空经验与县域城乡关系再认识[J]. 社会学研究, 2021(6): 45-67.
- [30] 肖索未. “严母慈祖”: 儿童抚育中的代际合作与权力关系[J]. 社会学研究, 2014(6): 148-171.
- [31] 杜鹏. 农民家庭转型中的生活政治——基于婆媳关系的分析[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6): 118-126.